

手机新闻使用、导向需求与信息环境 对政治知识的影响

李宗亚¹ 罗文辉² 魏 然³ 张国良⁴ 陈忆宁⁵ Edson Tandoc⁶

(1. 华中科技大学 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2. 香港浸会大学 传理学院, 香港 999077; 3. 香港中文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香港 999077; 4. 上海交通大学 媒体与传播学院, 上海 200240; 5. 台湾政治大学 传播学院, 台北; 6.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黄金辉传播与信息学院, 新加坡 639798)

【摘要】在智能手机时代,人们越来越常通过手机新闻来了解世界。本研究致力于探讨手机新闻使用对受众政治知识的影响,并以美国与朝鲜的关系局势为个案,在亚洲四座城市针对2988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手机新闻阅读与追踪频率能有效预测受众的政治知识水平。过去能够显著预测政治知识的经典变量,例如性别与导向需求,在手机新闻时代依然对政治知识具有显著的预测力。此外,本研究还发现,社会因素如信息环境也对民众的政治知识有显著影响。

【关键词】手机新闻; 政治及公共事务知识; 宏观环境因素; 微观个人因素; 亚洲研究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一、导论

过去十年间,我们目睹了智能手机用户数量的指数式增长。在2003年,智能手机全球出货量仅为957.12万部,而到2015年,这一数字已增加至14.32亿部(智研咨询,2016)。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7年在全球37个国家及地区进行的调查显示,智能手机的平均覆盖率已达到59%,其中,有13个国家或地区的覆盖率超过70%,有6个国家或地区超过80%,韩国的智能手机覆盖率甚至已达到94%,排名全球第一(Yannyzhou, 2018年7月)。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与智能手机的普及改变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获取新

【作者简介】李宗亚,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后。

罗文辉,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教授。

魏 然,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张国良,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教授。

陈忆宁,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教授。

Edson Tandoc,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黄金辉传播与信息学院副教授。

闻资讯的方式。越来越多的新闻受众，尤其是年轻受众，开始习惯通过手机新闻来了解时事、获取资讯。手机新闻，泛指通过手机上的新闻客户端、新闻网页、社交媒体平台（如Twitter、微博等）、RSS阅读器，以及手机报等渠道获取的新闻（Wei et al., 2013）。近年来的研究发现，手机新闻的使用场景也不再局限于上下班途中与碎片时间里（Dimmick et al., 2011），在日常生活与工作场合中的使用也愈加频繁（Schröder, 2014），手机新闻因此也成为当代人“媒介生活”（media life）（Deuze, 2012）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手机的轻巧、便于携带与新闻内容的短小精悍，得以让用户在短时间内获悉更多资讯，这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新闻收视习惯，也增加了当代人的整体新闻收视水平，尤其是青年群体的新闻收视情况有了显著提升（Chan, 2015; Pew Research Center, 2012）。过去的研究显示，收看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的新闻对人们的政治与公共事务知识获取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Chaffee et al., 1994; Drew & Weaver, 2006; Scheufele & Nisbet, 2002）。手机新闻的流行与普及是否也会显著提升人们的政治与公共事务知识，值得进一步探讨。到目前为止，学术界探讨手机新闻与政治知识关系的研究非常有限，在亚洲地区进行的相关研究更是付之阙如。因此，本研究选择了四个具有代表性的亚洲城市——上海、香港、台北以及新加坡，试图探究手机新闻使用对于四个城市民众政治知识的影响。与此同时，本研究也试图了解在传统新闻收视时代，能够显著预测政治与公共事务知识的经典变量，如性别与导向需求等变量，在手机新闻时代是否依然对政治知识具有显著的预测力。此外，本研究还意图探究宏观社会因素（如信息环境）是否会影响民众的政治知识水平。

二、研究背景

作为冷战对抗的延续，朝核问题一直是威胁美国与朝鲜关系的定时炸弹。朝鲜指控美国对其国家安全造成巨大威胁，而美国则坚持要求朝鲜放弃核武计划，双方几十年来争执不断，关系起伏不定。朝鲜的防抗立场在2017年达到新高度，这一年，朝鲜先后进行了25次导弹测试，并于9月3日进行了第六次核弹试验。次日，美国即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制裁朝鲜的决议案并获得通过。朝美双方之间的相互威胁继续升级，半岛局势阴云密布，两国关系重回冰点。

朝美双边的紧张局势严重影响着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朝美关系也因此成为这一地区舆论关注的焦点。在朝鲜进行了第六次核弹试验后，有关朝美关系的新闻报道更是铺天盖地席卷而来，成为2017年最受媒体与公众关注的事件之一。为了了解生活在亚洲地区的民众从新闻中获取相关资讯、了解朝美关系的情形，本文决定以2017年美国与朝鲜关系局势作为研究切入点，探究人口统计变量、导向需求以及手机新闻阅读与追

踪频率是否能预测人们对于美国与朝鲜关系的了解程度。

三、文献综述

(一) 移动新媒体语境下的传统变量：性别与导向需求

1. 政治知识中的性别鸿沟

一直以来，知识的获取与分布在不同社会群体中通常是不平等的，政治及公共事务知识也不例外。过去的研究显示，人口统计学变量中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以及收入水平等差异，都会造成政治及公共事务知识分布的不平等。其中，政治知识及政治参与的性别差异由来已久，而且根深蒂固。大量实证研究表明，与女性相比，男性对于政治事件及新闻的关注度较高，所掌握的政治知识较多，也更可能参与政治活动（Burns et al., 2001; Delli et al., 1996; Dow, 2009）。

政治参与及政治知识分布出现性别鸿沟（gender gap）的原因很多，最根本的解释是社会责任的分工。社会化理论（socialization theory）认为，传统的社会规范要求男性积极投入到公共生活中，而女性的主要责任则是经营家庭与抚养子女（Delli et al., 1996）。这样一来，女性不得不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家庭，因此投入到政治活动中的时间就十分有限。换句话说，女性想要参与政治活动需要付出额外的成本，这也就变相提高了女性参与政治的门槛（Fraile, 2014）。

社会责任分工使女性比较不容易参与政治活动外，性别社会化还造成了社会经济、教育与就业资源分配的不平等，进一步阻碍女性参与政治（Fraile, 2014; Tolleson-Rinehart & Josephson, 2000）。长久以来，在教育与就业问题上，女性经常受到性别歧视与不公平对待，因此限制了她们接受教育的机会与收入水平。研究显示，教育与收入水平的提升有利于促进知识获取与政治参与。因此，较低的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成为女性参与政治活动的另一障碍，进一步扩大了政治世界中的性别鸿沟。

传统的社会分工以及资源分配上的不平等也深刻影响着女性的思维方式，让女性从心底对政治生活产生冷漠感与疏离感。女性被教化成相信政治是男人的游戏（man's game），政治世界应该由男人主导，导致她们从小就对男人的游戏较无兴趣，也缺乏热情。与此同时，资源与机会成本的限制，也让她们没有足够的精力与动力来培养自己的政治兴趣，提升政治素养。即便保守的社会规范并未明确书写在法律条文中，母亲对政治的冷漠与疏离仍然会对子女产生很大影响（Tolleson-Rinehart & Josephson, 2000）。因此，即便是年轻一代的女性，其对政治的了解程度与参与情况也并没有显著提升。

总的来说，性别社会化的差异导致了社会责任分配与资源分布的不平等，限制女性参与政治活动的机会与资源，也使女性缺乏参与政治必须具备的个人能力与认知水平。

与此同时，传统的角色定位与社会分工已植根于人们思想中，积重难返，进一步扼杀了女性参与政治的动力与热情。因此，女性的政治参与程度以及知识水平普遍低于男性。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也没有消除政治生活中的性别鸿沟。近年来，网络媒介及移动新媒体的相关研究显示，男性在社交媒体上的政治表达与讨论频率依然高于女性（Bode, 2016; Strandberg, 2013），对政治及公共事务知识的熟悉程度也普遍高于女性（Dow, 2009; Fraile, 2014），在竞选、投票、捐款等各种政治活动中的参与程度也比女性高（Karpowitz & Mendelberg, 2014; Nir & McClurg, 2015）。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人们获取信息的成本远低于从前，然而，信息的丰富性与便利性并没有消除政治知识的性别鸿沟。主要的原因是，男性与女性对新闻内容的偏好存在显著差异。一般来讲，男性对于政治及公共事务的兴趣较高，因此他们对相关新闻的接触频率与注意程度也高于女性。而女性则更关注与娱乐、时尚、消费、家庭等相关的内容资讯。由于新闻是人们获取知识的主要渠道之一，男性对政治新闻的偏好使他们比较常收看国际政治新闻，因此比女性更容易从新闻中了解国际政治，获取相关知识。据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男性受访者对美国与朝鲜关系的了解程度明显高于女性受访者。

2. 导向需求与政治知识获取

导向需求（need for orientation, NFO）是议程设定（agenda-setting）理论的重要概念，这个概念由McCombs与Weaver（1973）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指的是个人通过大众媒介来熟悉环境的需求。导向需求的前提是，人们通常有熟悉与掌控周遭环境的意愿与需求（Weaver, 1980）。McCombs和Weaver用相关性（relevance）与不确定性（uncertainty）两个维度来界定导向需求（McCombs & Weaver, 1973; Weaver, 1980）。他们认为，当人们感到某一话题与自己相关性高，且对该话题的不确定性也较高时，就会呈现较强的导向需求。

过去的研究发现，导向需求是媒介使用与媒介效果的有力预测变量，决定着媒介使用可能产生的结果（Matthes, 2008; McCombs & Weaver, 1973）。McCombs与Weaver（1973）发现，导向需求高的人较有可能通过媒介来获取资讯，也较可能受到媒介议程设置的影响，接纳媒介的议程。具体而言，导向需求高的人倾向使用媒介来积极搜寻信息与获取资讯，从而满足他们在政治及公共事务领域的信息需求（Lee & Oh, 2013; McCombs & Reynolds, 2002），由此一来，他们便得以在搜寻信息的过程中获取知识，提高政治效能，进而参与政治（Krueger, 2005）。此外，导向需求也会促进新闻思考与讨论，促使人们投入更多注意力与精力来处理资讯，并获取更多的知识（Lee & Oh, 2013）。有学者还发现导向需求会增强人们从事认知活动时的沉浸程度与享受程度，而这种在获取信息过程中的沉浸与享受程度也可以有效促进知识获取（Gantz, 1978; Chew & Palmer, 1994）。

当人们的周遭环境出现不确定性，且话题与自己的相关度又较高时，例如评判新的候选人或了解复杂的政治问题，导向需求通常会增加。一般来说，导向需求越高的人，媒介使用频率也越高，投放到媒介资讯中的注意力也越高，新闻思考与政治讨论也会相应增加，最终获取到的政治与公共事务知识也就更多。据此，本文做出如下假设：

H2：受访者的导向需求越高，对美国与朝鲜关系的了解程度越高。

（二）手机新闻

2010年，芬兰最大的服务运营商Radiolinja（现已更名为Elisa）通过手机短信每日将免费的头条新闻发送给用户，标志着手机新闻的出现。自此之后，众多新闻机构及媒介组织纷纷效仿，陆续推出与推广手机新闻服务。

近年来，用户对于手机新闻的需求水涨船高，越来越多的新闻受众开始依赖手机获取新闻，知悉时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2017年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85%的美国成年人通过智能手机获取新闻，在2016年用手机获取新闻的比例是72%，在2013年则只有54%（Michael & Mitchel, 2017）。另外，针对美国最受欢迎50大新闻网站的一项调查显示，39家网站的移动流量已经超越桌面流量，越来越多的桌面用户开始通过智能手机来获取新闻（Mitchell & Page, 2015）。通过手机浏览与阅读新闻逐渐成为获取新闻的主要渠道。

手机新闻的发展与普及不只出现在西方国家，亚太地区也呈现类似趋势。艾瑞咨询在2017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87%的中国网民主要通过手机新闻客户端或手机新闻网页获取新闻，70%的受访者使用社交媒体平台浏览新闻，41%的网民收看电视新闻，只有27%的网民通过报纸获取信息。路透社数字新闻报道研究所（Reuters Institute Digital News Report）在2018年的调查显示，智能手机已成为台湾地区居民获取新闻时最常使用的设备，其使用率比电脑高出近20%。在香港地区，已有超过70%的受访者使用智能手机浏览新闻（Nic et al., 2018）。

尽管过去的研究显示，传统新闻收视能有效促进政治学习与知识获取，但是这一结论在移动新媒体时代是否能成立需要更多实证依据。与此同时，过往在西方进行的结论是否适用于东方社会语境，也亟待进一步检验。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我们在上海、香港、台北以及新加坡四地同时开展了大规模问卷调查，目的就是探究在亚洲地区，手机新闻使用是否能够提高民众的政治知识。

（三）手机新闻阅读与政治知识获取

高速运转的现代生活让人们很难拥有充足的时间，阅读完一份报纸，或者看完一档完整的电视新闻节目，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浏览手机新闻来了解世界。与此同时，人们耗费在上下班路上的时间也逐渐增加，在动荡的车厢里以及拥挤的等车人潮中，人们逐渐习惯掏出手机来打发时间。手机凭借它比其它媒体更适合在碎片时间与移动空间中使用

的优势，赢得了用户青睐。正如Dimmick等人所言（2011），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媒体正是通过占领时间与空间上的利基市场，终于在今天的媒介市场中杀出重围，占据主导地位。

过去许多实证研究的结果显示，在控制传统媒体新闻收视、政治兴趣及人口统计变数等影响因素的情况下，网络新闻使用依然能显著预测政治学习与知识获取（Dimitrova et al., 2014; Drew & Weaver, 2006; Kim, 2018）。鉴于智能手机除了继承网络媒体资源丰富以及互动性强等特色外，还具有随时随地、高效、方便快捷等独特优势，因此本研究推测，手机新闻使用应该能有效促进政治学习与知识获取。

具体而言，手机新闻使用能够促进知识获取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手机新闻使用通过激发用户的学习动力与兴趣来促进其从新闻中获取知识。手机新闻将新闻收视的主动权交还给用户，任其自由选择收视的具体内容、方式、时间与地点。与此同时，智能手机还会根据用户的浏览、搜索、订阅等偏好为其进行实时的个性化信息推送。自主性的增强与个性化功能体验，能够激发用户的学习兴趣与热情，增强学习动力，提高注意力与思考力，从而有效促进知识获取（Eveland & Dunwoody, 2001; Kruikemeier et al., 2018）。

其次，智能手机的平台、资源以及功能优势为用户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使得新闻收视更加方便、快捷、高效且充满乐趣，故而能够有效促进知识获取（Delli Carpini & Keeter, 1996）。（1）智能手机为用户提供了各种新闻收视的平台与渠道，例如手机新闻客户端、社交媒体以及搜索引擎等，显著增加了用户接触新闻、获悉资讯的机会（Elenbaas et al., 2014; Zaller, 2003）。（2）手机新闻平台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为用户提供了丰富且多样的资讯与观点（Sveningsson, 2015）。用户透过智能手机，不仅能获得比以往更多的新闻资讯，甚至能够获取到他们闻所未闻的信息，从而开阔眼界，增长见闻（Hermida et al., 2012）。（3）手机新闻平台丰富且成熟的功能让新闻收视更加容易与轻松。例如，离线阅读功能、RSS订阅功能、实时信息推送功能等让用户随时随地获悉新鲜资讯，充分利用碎片时间学习充电。（4）手机新闻平台与社交平台的联动不仅增强了新闻收视的乐趣，其丰富的分享渠道、方便的跟帖回复功能，也鼓励用户之间的讨论与交流，促进深度思考，进而增进对新闻资讯的了解（Kruikemeier et al., 2018; Van Cauwenberge et al., 2015）。总的来说，智能手机通过多样的新闻平台与渠道，丰富的信息资源，成熟的功能以及强大的交互性，为用户从新闻中学习知识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尽管针对手机新闻使用与政治知识获取之间的研究相对较少，但有关手机新闻使用与政治及民主行为的研究较为普遍。这些研究发现，手机新闻的使用能够有效促进公民的政治参与（Gil de Zúñiga et al., 2012; Kwak et al., 2011; Skoric & Poor, 2013），提高政治兴趣（Holt et al., 2013），以及鼓励政治表达与讨论（Gil de

Zúñiga et al., 2014; Kim, 2018)。过去的研究显示，政治兴趣、政治讨论与政治参与对政治知识的获取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本研究认为手机新闻使用可以提高用户的政治知识。据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3：手机新闻阅读能够增强用户对美国与朝鲜关系的了解。

（四）手机新闻追踪与政治知识获取

除了传统的新闻阅读与信息检索活动，用户还可以通过智能手机展开新闻追踪活动（following news），即通过在手机新闻客户端中订阅相关新闻版块，或者在社交媒体上关注新闻组织，专业记者、公民记者以及草根意见领袖等方式，来追踪最新时事，获悉舆论走向。

互联网与智能手机的融合，让社交媒体用户呈现爆炸式增长，用户粘性与使用强度也不断增强。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新闻机构与专业记者开始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新闻、分享资讯（Yu, 2011）。而公民记者的参与也使社交平台上的信息资源更为丰富。用户只需在社交平台关注自己感兴趣的账号，便可以随时随地获知新鲜资讯。2014年，美国新闻研究所、Twitter以及DB5研究公司联合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有近90%的Twitter用户使用这一平台来浏览新闻，其中，有74%的用户每天使用Twitter追踪新闻。超过60%的Twitter用户认为他们目前对新闻的关注度与了解程度远超使用社交媒体之前（Bergström & Jervelycke Belfrage, 2018）。

与被动地接受新闻推送不同，新闻追踪一般是带有明确目的的主动行为。例如，在社交平台上关注特定新闻机构的官方账号或记者，体现了用户希望从这些账号中持续不断地获取资讯与观点的意愿。这一行为，类似于传统的订阅报纸或者定期收看特定的电视节目，是用户主动且目的明确的新闻收视活动。新闻追踪可以保证用户能够持续规律地获得自己感兴趣的新闻资讯，因此能有效激发用户的学习热情，鼓励用户投入更多的注意力，促进新闻思考，从而更有利于从新闻中学习到相关知识。据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4：通过手机来追踪新闻能够增强用户对美国与朝鲜关系的了解。

（五）信息环境对民众政治知识水平的宏观影响

过去有关政治学习的研究大多将个体属性作为主要预测变量，集中探究个人的政治兴趣、学习动机、媒介使用频率等变量对于知识获取的影响（Price & Zaller, 1993）。不可否认，这些个体属性对于公众的政治学习效果具有显著的影响。然而，环境因素的影响也不容小觑。事实上，知识沟（knowledge gap）不仅存在于信息富人（the information rich）与信息穷人（the information poor）之间，生活在信息富裕社会（information-rich society）与信息贫困社会（information-poverty society）中的民众之间也存在知识沟。在通常情况下，生活在信息富裕社会中的民众

普遍要比生活在信息贫困社会中的民众知识水平更高。

一般来说，在信息充盈的环境中，个体属性的重要性会相对减弱。即便是对公共事务不甚关心、认知能力相对有限的民众，也会因为身处信息丰富的环境而能够即时获悉新鲜资讯，了解重大新闻议题，从而获取知识。相对而言，在信息匮乏的环境中，获取信息变得充满挑战，个体层面激励因素的重要性变得突出。只有对公共事务充满兴趣与热情，且有能力、有渠道的民众才能够知悉时事，获得充足的知识（Iyengar et al., 2010; Trilling & Schoenbach, 2013）。总的来说，社会的信息富裕程度会影响民众政治与公共事务知识的整体水平。

影响城市信息富裕程度的因素有很多，主要的因素包括城市的整体发展水平与竞争力（Foreign Policy, 2010）以及信息与通信技术（ICT）的发展水平（Kauffman & Techatassanasoontorn, 2010）。一般来说，整体发展水平高的国家与地区，尤其是经济发达的地区，才能有足够的物力与财力投入ICT产业的发展，才能不断完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的建设，提高移动互联网与智能终端的到达率与普及率，为信息社会提供硬件保障。除此之外，流通语言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也有利于提高城市的信息富裕程度。

据前所述，本文将通过城市竞争力、ICT发展水平以及语言多样性三个指标综合评定城市的信息富裕程度。从科尔尼（A. T. Kearney）公布的2018—2019年度城市竞争力排名来看，新加坡最高，香港次之，上海与台北分列三四位。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 WEF）发布的《2016年全球信息技术报告》中使用网络就绪指数（Networked Readiness Index）来衡量ICT（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技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效，该报告显示，新加坡的信息技术发展水平排名全球第1，香港排名第12，台北排名第19，而中国大陆排名第59（因此报告未对上海地区进行单独排名，故暂以中国大陆排名代表上海地区排名）。最后，从语言多样性的角度来看，新加坡的官方语言有四种，香港推行两文三语，而台北及上海均只有中文一种官方语言，因此，新加坡的语言多样化程度最高，香港次之，台北及上海语言较为单一。

表1 城市竞争力、ICT发展指数以及语言多样性对比表

	上海	香港	台北	新加坡
全球城市竞争力 ^a	28	7	46	4
ICT发展水平排名 ^b	59（大陆地区）	12	19	1
官方语言	中文	两文三语：中文、英文、普通话、粤语、英语	中文	英语、马来语、华语、泰米尔语

数据来源：^a科尔尼（A.T. Kearney）“全球城市指数”（Global Cities Index, CGI）综合实力榜排名（2018-2019）

^b世界经济论坛（WEF）“网络就绪指数”（Networked Readiness Index）排名（2016）

表1显示,新加坡在城市竞争力、ICT发展程度及语言多样性上的优势显著,因此综合来看,新加坡的城市信息富裕程度在本文所选取的四座城市中应该居于首位。香港的ICT发展水平、城市竞争力与语言多样性也颇为不俗,整体而言,城市信息富裕程度应仅次于新加坡,排名第二。台北的城市竞争力虽略低于上海,但其ICT发展水平显著高于上海,两地的语言均较为单一,因此,综合考量,台北的城市信息富裕程度应略高于上海。总的来说,四个城市的信息富裕程度排名应为新加坡第一,香港次之,台北第三,上海第四。

根据前面的分析,本研究推测信息富裕程度较高的城市,其民众的政治知识水平也普遍较高,而信息富裕程度较低的城市,民众对于政治知识的了解程度也会较低。据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5: 城市信息富裕程度越高,民众对于美国与朝鲜关系的了解程度越高。

四、研究方法

(一) 抽样及问卷调查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来探讨性别、导向需求、手机新闻阅读与追踪以及城市信息富裕程度对上海、香港、新加坡以及台北大学生有关美国与朝鲜关系了解程度的影响。本文选取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智能手机在大学生群体中的普及率很高,几乎人手一部。此外,大学生对于移动设备与互联网的依赖性也很高,智能手机往往是他们浏览新闻、获取资讯的最主要媒介。

本研究采用多阶段整群抽样(multi-stage cluster sampling)的方法在四个城市中选取目标院校并展开问卷调查。根据每个城市的大学院校总数,分别从各城市的院校中抽取2~6所学校。再从每个被选取的院校中,抽取三个通识课班级。在事先征得教师同意的情况下,在选定的班级中展开自填式问卷调查。数据收集工作于2017年秋季开始,到2018年春季结束。

此次调查共获得2,988份有效问卷,其中734名(24.6%)受访者来自香港,754名(25.2%)受访者来自上海,671名(22.5%)受访者来自新加坡,以及829名(27.7%)受访者来自台北。所有受访者中,女性占58.1%,男性占41.9%,平均年龄为21.05岁($SD=2.07$)。2988名受访者中,大一学生占17.5%,大二学生占27.3%,大三学生占23.6%,大四学生占14.8%,剩余的16.8%是研究生。

(二) 研究变量与测量方法

1. 手机新闻阅读频率。参考过去的相关研究(Wei et al., 2013),本文通过六个题项来测量受访者使用手机阅读新闻的频率,分别是:(1)使用手机阅读网站上的新

闻；（2）阅读网站手机版新闻；（3）经由手机应用程序（如Line/微信）阅读新闻；（4）用手机听广播新闻；（5）看手机版的电视新闻；（6）用手机听播客（podcast）新闻。受访者可选择的频率范围是从1（从未）到4（经常）。我们将受访者在在这六个题项上的得分加总除以6，建构“手机新闻阅读频率”指标（ $M=2.43$ ； $SD=.59$ ； $\alpha=.75$ ）。

2. 手机新闻追踪频率。本研究通过六个题项来测量受访者用手机追踪新闻的频率，分别是：（1）在社交网络上关注一个新闻机构；（2）在社交网络上关注一位新闻工作者；（3）关注一个新闻博客（Blog）；（4）关注一个新闻博客作者（Blogger）；（5）关注新闻机构上的微博公共账号最新消息；（6）关注新闻工作者的微博最新消息。我们将受访者在在这六个题项上的得分加总除以6，建构“手机新闻追踪频率”指标（ $M=2.43$ ； $SD=.82$ ； $\alpha=.89$ ）。

3. 导向需求。参考过去的研究，导向需求的测量是询问受访者是否同意下列陈述句（回答方式从“非常不同意”=1分，到“非常同意”=5分）：（1）我需要即时了解国内及国际时事；（2）即时了解国内及国际时事对我而言很重要；（3）获取新闻以及跟进时事进展对我而言很重要；（4）我希望对这个瞬息万变的社会有更好的了解；（5）我希望对重大的社会议题有更深入的了解。我们将受访者在在这五个题项上的得分加总除以5，建构“导向需求”指标（ $M=3.78$ ； $SD=.74$ ； $\alpha=.78$ ）。

4. 美国与朝鲜关系的相关知识。测量受访者对于美国与朝鲜关系了解程度的方法，是依据有关新闻报道，建构五个题项，每道题目有四个选项，有且仅有一个选项为正确答案，每答对1题得1分，受访者得分最高5分，最低0分。具体题项及相关统计数据如表2所示。

表2 美国与朝鲜关系的相关知识题项及受访者回答正误率统计

题项	正确率	错误率	平均值(标准差)
1. 自2006年，朝鲜共进行了几次核试验？	21.3%	78.7%	0.21(0.41)
2. 现任美国国务卿为以下哪位？	21.7%	78.3%	0.22(0.41)
3. 2017年10月25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瓦姆比尔法案”(Otto Warmbier)，这项法案的目标是以下哪个？	31.6%	68.4%	0.32(0.47)
4. 2017年10月9日美国航空母舰驶入朝鲜半岛东部海域，该航母的名字是以下哪个？	17.2%	82.8%	0.17(0.38)
5. 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彻底摧毁朝鲜”言论，这一论述是否正确？	30.9%	69.1%	0.31(0.46)
综合指数			0.25(1.20)

5. 城市信息富裕程度。本文根据四座城市在城市竞争力、ICT发展水平以及语言多样性上的综合表现来对城市信息富裕程度进行排名。其中，城市竞争力排名出自科尔尼

(A. T. Kearney) “2018—2019全球城市指数” (Global Cities Index, CGI) 的综合实力榜排名; ICT发展指数排名来源于国际电信联盟 (ITU) “2017信息与通信技术发展指数” (ICT Development Index, IDI) 排名; 语言多样性来自于各国官方提供的资料。四个城市的信息富裕程度排名为: 新加坡第一、香港第二、台北第三、上海第四。

6. 人口变量。本研究测量的人口变量包括: 性别、年龄与年级。过去的研究显示, 这些变量可能会影响人们的手机使用、新闻收视以及知识获取。

五、数据分析

本文通过阶层回归分析来验证研究假设, 分析结果在表4中呈现。在回归分析中, 第一阶层输入了人口变量, 包括性别与年龄; 第二阶层输入导向需求; 第三阶层输入手机新闻阅读频率, 第四阶层输入手机新闻追踪频率, 最后一个阶层输入城市信息富裕程度。因变量为受访者在美国与朝鲜关系相关知识上的得分。

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 性别可以显著预测受访者在美国与朝鲜关系相关知识上的得分 ($\beta = .12, p < .001$)。也就是说, 男性比女性了解美国与朝鲜关系现状。因此, H1获得支持。导向需求也可显著预测受访者的知识得分 ($\beta = .14, p < .001$)。导向需求越高的受访者, 其对美国与朝鲜关系的了解程度越高。因此, H2也获得支持。手机新闻阅读频率 ($\beta = .06, p < .01$) 与追踪频率 ($\beta = .07, p < .01$) 均能显著预测知识得分。也就是说, 越常使用手机阅读与追踪新闻的受访者, 越了解美国与朝鲜的关系现状。因此, H3与H4均获得支持。最后, 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 城市信息富裕程度是预测知识得分的最显著变量 ($\beta = .18, p < .001$)。信息富裕程度越高的城市, 其民众对于美国与朝鲜关系的了解程度越高。变量分析也显示, 四个城市信息富裕度排名从高到低分别是新加坡、香港、台北与上海, 因此新加坡民众有关美国与朝鲜的相关知识水平最高, 香港次之, 台北第三, 上海最低, 详情见表5。因此, H5获得支持。

表3 性别、导向需求、手机新闻阅读与追踪频率、城市信息富裕程度以及知识得分之间的相关关系

变量	1	2	3	4	5
1. 性别	----				
2. 导向需求	-.03	----			
3. 新闻阅读频率	.07***	.24***	----		
4. 新闻追踪频率	-.05**	.19***	.45***	----	
5. 城市信息富裕程度	.03	.04*	-.17***	-.27***	----
6. 美国与朝鲜关系相关知识	.13***	.16***	.11***	.07***	.15***

注: (1) N=2,101 (2) *** $p < .001$; ** $p < .01$; * $p < .05$, # $p < .08$ (3) 变量编码及重新编码情况如下: 手机新闻的阅读与追踪频率范围是从1 (从未) 到4 (经常); 导向需求的变化范围是从1 (非常不同意) 到5 (非常同意); 城市信息富裕程度的变化范围是从1 (非常不富裕) 到4 (非常富裕)。

表4 预测美国与朝鲜关系相关知识之阶层回归分析

自变量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五
第一阶层：人口变量					
性别	.13***	.13***	.13***	.13***	.12***
年龄	.00	-.02	-.02	-.02	-.01
第二阶层：导向需求					
导向需求		.17***	.16***	.16***	.14***
第三阶层：手机新闻阅读					
手机新闻阅读频率			.06**	.05*	.06**
第四阶层：手机新闻追踪					
手机新闻追踪频率				.02	.07**
第五阶层：城市信息富裕程度					
城市信息富裕程度					.18***
Incremental adjusted R ²	1.5%	2.9%	0.2%	0.0%	2.8%
Total adjusted R ²	1.5%	4.4%	4.6%	4.6%	7.4%

注：（1）N=2,101（2）*** $p < .001$ ；** $p < .01$ ；* $p < .05$ ，# $p < .08$ （3）变量编码及重新编码情况如下：手机新闻的阅读与追踪频率范围是从1（从未）到4（经常）；导向需求的变化范围是从1（非常不同意）到5（非常同意）；城市信息富裕程度的变化范围是从1（非常不富裕）到4（非常富裕）。

表5 四个城市受访者对于美国与朝鲜关系了解程度的描述统计

	总样本 N=2,936	上海 N=754	香港 N=734	台北 N=829	新加坡 N=657	F value
美国与朝鲜相关知识	1.24 (1.20)	.98 (1.14)	1.42 (.47)	1.16 (1.12)	1.43 (1.21)	24.53***

注：（1）表内数据为标准化回归系数（2）*** $p < .001$ ；** $p < .01$ ；* $p < .05$ ，# $p < .08$

六、结论与建议

智能手机的普及，让越来越多的用户开始通过手机浏览新闻、获悉资讯，这种趋势在年轻用户群体中尤为显著。然而，手机新闻的流行与风靡并没有在学界引起足够的重视。专门探讨手机新闻使用的研究本就凤毛麟角，而仅有的相关研究也大多在西方社会语境下展开，亚洲地区的手机新闻与媒介效果研究数量非常有限。因此，本研究探讨以上海、香港、台北以及新加坡四个城市为代表的亚洲地区手机新闻使用现状，希望了解人口变量、城市变量（城市信息富裕程度）、需求变量（导向需求）以及手机新闻阅读与追踪等变量对于政治知识的影响。

政治知识中的性别鸿沟由来已久。即便民主化进程不断推进，信息门槛一再降低，也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政治知识版图中男强女弱的局面。尽管目前政治权利与社会资源的性别平等程度已经显著提升，但女性的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依然普遍低于男性，社会提供给女性参与政治的机会也依然有限，因此女性想要参与政治仍然面对重重障碍与道道

门槛。与此同时，由于女性长久以来被隔绝在政治生活之外，不少女性逐渐丧失了对政治世界的好奇与热情。再加上传统社会责任分工观念造成女性对于政治的冷漠与疏离，使得年轻一代、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也缺乏足够的动力与热情参与政治。客观上社会资源与机会分配的不平等，以及主观上动机与兴趣的缺乏，造成了女性对朝美关系的了解程度明显低于男性（Burns, 2007; Delli Carpini & Keeter, 1996）。

过去的研究显示，新闻收视能显著预测政治知识的增长。本研究分析结果显示，随着手机新媒体的流行与普及，阅读手机新闻也能有效增长政治知识。本研究在上海、香港、台北以及新加坡四地展开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经常使用手机阅读新闻以及追踪新闻的受访者，对美国与朝鲜关系的了解程度更深，相关知识水平更高。

忙碌的都市生活节奏，让人们处于移动空间（如地铁、公交）中的碎片时间显著增多。尽管人们很难有充足的时间阅读完一份报纸，或者观看完一档电视新闻，但是通过手机上的新闻客户端与新闻网页，人们可以随时随地阅读新闻，也可以通过关注新闻机构以及新闻工作者的社交账号即时追踪新闻。

使用手机阅读新闻，用户具有充分的自主性，他们可以任意选择阅读的内容、方式、时间与地点。与此同时，手机与互联网的融合，使其拥有了更丰富的信息资源、更人性化的功能以及更强大的交互性。这些独特的优势让智能手机也可以根据用户的使用偏好来为其推送个性化的资讯，不仅使新闻收视更为方便有效，也为新闻收视增添了乐趣与动力，因此更能增加用户粘性与使用强度，从而促进政治知识的获取与增长。

通过关注新闻机构、专业记者、以及草根意见领袖的社交账号与博客来追踪新闻，是一种带有明确目的性的主动行为。它让用户能够持续稳定地获取自己感兴趣的资讯，有效激发用户的学习兴趣与热情，鼓励用户投入更多的注意力与精力，增加新闻思考与讨论，从而促进政治学习与知识获取。

综合来说，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过去能够显著预测政治学习与知识获取的变量，例如性别与导向需求，时至今日依然能有效预测手机新闻对政治知识的影响。而随着信息技术的更新换代，人们对传统媒体的依赖逐渐减弱，转而投向移动新媒体的怀抱。尽管浏览新闻的方式、设备与习惯发生了改变，但是新闻使用对于政治学习的促进作用并未改变。当然，本研究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发现宏观环境因素，例如城市信息富裕程度，也深刻影响着民众的政治知识水平。对亚洲四个城市2,988名受访者的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对于美国与朝鲜关系的了解程度有显著的差异。新加坡受访者的相关知识水平最高，香港次之，台北第三，上海最低。这是由于四个城市的社会信息富裕程度存在差别。一般来说，经济发达程度、信息与通讯技术发展水平以及语言多样性程度较高的城市，社会的信息富裕程度也会较高。在信息富裕度较高的城市中，人们可以通过方便快捷的移动通信技术与丰富多样的新闻报道轻而易举地获取国际政治资讯、了解时事。

而生活在信息富裕度较低的城市中，人们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来获取国际政治资讯。因此，民众的政治知识水平不仅会受到兴趣、动机、认知能力等个人属性的影响，宏观环境因素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本研究的主要限制，是研究结果的推论能力。本研究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大学生的手机使用频率与强度普遍高于一般民众。因此本研究的结果不一定能推论至一般民众。未来的研究应以一般民众为研究对象，把一般民众纳入考察范围，才能使研究结果更具普适性。本研究的另一限制，是仅以专业新闻机构及记者生产的新闻内容为主要研究对象，忽略了用户生产的内容。事实上，用户在微博、微信和Line等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内容，也逐渐成为公共信息中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成为政治知识的重要来源之一。因此，未来的研究应该将用户生产的内容纳入考察范围来扩展手机新闻的范围，使得手机新闻测量更加完整全面。本研究的第三个限制，是所选取的有关美国与朝鲜的知识题目较少、难度较高，受访者的平均得分普遍较低，进而限制了自变量对知识水平的预测力。未来的研究应增加测量题目，并尽量拉开题目难易度的差距，提高受访者的得分变异量，才能更充分展现自变量对知识水平的影响程度。与此同时，对于政治知识的测量，未来的研究不应仅局限于客观知识水平以及对相关议题的了解程度，还应对公民的政治认知能力（political cognitive ability）、政治意识（political awareness）、政治练达（political sophistication）等方面做更详细的考核，以期实现对政治知识更全面的考量。本研究的第四个限制，是未将受众的“政治兴趣”与“政治效能”作为控制变量纳入考核。过去的研究显示，这两组变量不仅与性别、导向需求及新闻使用关联密切，还对政治知识有显著预测力。因此，未来的研究应把“政治兴趣”与“政治效能”纳入考察范围，从而增强对政治知识的预测力。

参考文献：

- [1] 智研咨询集团. 2017-2022年中国智能手机市场运行态势及发展前景预测报告[EB/OL]. <https://www.chyxx.com/research/201611/469035.html>, 201611.
- [2] Yannyzhou. 智能手机普及率：韩国94%全球第一，中国68%居中游[EB/OL]. <https://tech.qq.com/a/20180625/011929.htm>, 20180725.
- [3] Wei, R., Lo, V., Xu, X., Chen, Y.-N. K., and Zhang, G. "Predicting Mobile News Use Among College Students: The Role of Press Freedom in Four Asian Cities." *New Media & Society* 16.4 (2013):637-654.
- [4] Dimmick, J., Feaster, J. C., and Hoplamazian, G. J. "News in The Interstices: The Niches of Mobile Media in Space and Time." *New Media & Society* 13.1 (2011):23-39.
- [5] Schröder, K. C. "News Media Old and New." *Journalism Studies* 16.1 (2014):60-78.
- [6] Deuze, M. *Media life*. Boston, MA: Polity Press, 2012.
- [7] Chan, M. "Examining the Influences of News Use Patterns, Motivations, and Age Cohort on Mobile News Use: The Case of Hong Kong." *Mobile Media & Communication* 3.2 (2015):179-195.
- [8] Pew Research Center. The State of the News Media 2012: An Annual Report on American Journalism. Retrieved from <http://stateofthemediamedia.org/2012/mobile-devicesand-news-consumption-some-good-signs-for-journalism/?src=pre>

number#fn-11552-2.

- [9] Chaffee, S. H., Zhao, X., and Leshner, G. "Political Knowledge and the Campaign Media of 1992."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1.3 (1994):305-324.
- [10] Drew, D., and Weaver, D. "Voter Learning in the 2004 Presidential Election: Did the Media Matter?."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83.1 (2006):25-42.
- [11] Scheufele, D. A., and Nisbet, M. C. "Being a Citizen Online: New Opportunities and Dead Ends." *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7.3 (2002):55-75.
- [12] Burns, N., Schlozman, K. L., and Verba, S. *The Private Roots of Public Action: Gender, Equality,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13] Delli Carpini, Michael X. and Scott Keeter. *What Americans Know about Politics and Why it Matter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14] Dow, J. K. "Gender Differences in Political Knowledge: Distinguishing Characteristics-Based and Returns-Based Differences." *Political Behavior* 31.1 (2009):117-136.
- [15] Fraile, M. "Do Women Know Less about Politics than Men? The Gender Gap in Political Knowledge in Europe.": *Soci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Gender, State & Society* 21.2 (2014):261-289.
- [16] Tolleson-Rinehart and Jyl. J. Josephson. *Gender and American Politics: Women, Men, and the Political Process*. Armonk, NY: M.E. Sharpe, 2000.
- [17] Bode, L. "Closing the Gap: Gender Parity in Political Engagement on Social Media."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4 (2016):587-603.
- [18] Strandberg, K. "A Social Media Revolution or just a Case of History Repeating itself? The Use of Social Media in the 2011 Finnish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New Media & Society* 15.8 (2013):1329-1347.
- [19] Karpowitz, C. F., and Mendelberg, T. *The Silent Sex: Gender, Deliberation, and Institu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 [20] Nir, L., and McClurg, S. D. "How Institutions Affect Gender Gaps in Public Opinion Expression."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79.2 (2015):544-567.
- [21] McCombs, M. E., and Weaver, D. H. "Voters' Need for Orientation and Use of Mass Communication."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Montreal, Canada, 1973.
- [22] Weaver, D. H. "Audience Need for Orientation and Media Effect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 (1980):361-376.
- [23] Matthes, J. "Need for Orientation as a Predictor of Agenda-Setting Effects: Causal Evidence from a Two-Wave Panel Stud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20.4 (2008):440-453.
- [24] Lee, E.-J., and Oh, S. Y. "Seek and You Shall Find? How Need for Orientation Moderates Knowledge Gain from Twitter U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3.4 (2013):745-765.
- [25] McCombs, M. and Reynolds, A. "News influence on our pictures of the world." *Media Effects: Advances in theory and research*. Eds. Bryant, J. and Zillmann, D., Mahwah: LEA, 2002:1-16.
- [26] Krueger, B. S. "Government Surveillance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n the Internet." *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 23.4 (2005):439-452.
- [27] Gantz, W. "How Uses and Gratifications Affect Recall of Television News." *Journalism Quarterly* 55.4 (1978):664-681.
- [28] Chew, F., and Palmer, S. "Interest, the Knowledge Gap, and Television Programming."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and Electronic Media* 38 (1994):271-288.
- [29] Michael, B., and Mitchell, A. Americans' Attitudes About the News Media Deeply Divided Along Partisan Line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journalism.org/2017/05/10/americans-attitudes-about-the-news-media-deeply-divided-along-partisan-lines/> .jsp, 20170510.
- [30] Mitchell, A., and Page, D. State of the News Media 2015. Retrieved from <http://www.journalism.org/2015/04/29/state-of-the-news-media-2015> .jsp, 20150429.
- [31] Nic, N., Fletcher, R., Kalogeropoulos, A., Levy, D. A., and Nielsen, R. K. *Reuters Institute Digital News Report 2018*. Oxford: 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2018.
- [32] Dimitrova, D. V., Shehata, A., Strömbäck, J., and Nord, L. W. "The Effects of Digital Media on Political Knowledge and Participation in Election Campaigns: Evidence from Panel Data." *Communication Research* 41.1 (2014):95-118.
- [33] Kim, M. "How does Facebook News Use Lead to Actions in South Korea? The Role of Facebook Discussion Network Heterogeneity, Political Interest, and Conflict Avoidance in Predicting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elematics and Informatics* 35.5 (2018):1373-1381.
- [34] Eveland Jr, W. P., and Dunwoody, S. "User Control and Structural Isomorphism or Disorientation and Cognitive Load? Learning from the Web Versus Print."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8.1 (2001):48-78.
- [35] Kruikemeier, S., Lecheler, S., and Boyer, M. M. "Learning from News on Different Media Platforms: an Eye-Tracking Experiment."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35.1 (2018):75-96.
- [36] Elenbaas, M., de Vreese, C., Schuck, A., and Boomgaarden, H. "Reconciling Passive and Motivated Learning: The Saturation-Conditional Impact of Media Coverage and Motivation on Political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41.4 (2014):481-504.
- [37] Zaller, J. "A New Standard of News Quality: Burglar Alarms for the Monitorial Citize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0.2 (2003):109-130.
- [38] Sveningsson, M. "It's Only a Pastime, Really': Young People's Experiences of Social Media as a Source of News about Public Affairs." *Social Media & Society* 1.2 (2015):2056305115604855.
- [39] Hermida, A., Fletcher, F., Korell, D., and Logan, D. "Share, Like, Recommend: Decoding the Social Media News Consumer." *Journalism studies* 13.5-6 (2012):815-824.
- [40] Van Cauwenberge, A., d'Haenens, L., and Beentjes, H. "How to Take Advantage of Tablet Computers: Effects of News

- Structure on Recall and Comprehension." *Communications* 40.4 (2015):425-446.
- [41] Gil de Zúñiga, H., Jung, N., and Valenzuela, S. "Social Media Use for News and Individuals' Social Capital, Civic Engagement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7.3 (2012):319-336.
- [42] Kwak, N., Campbell, S. W., Choi, J., and Bae, S. Y. "Mobile Communication and Public Affairs Engagement in Korea: An Examination of Non-Linear Relationships between Mobile Phone Use and Engagement Across Age Groups."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1.5 (2011):485-503.
- [43] Skoric, M. M., and Poor, N. "Youth Engagement in Singapore: The Interplay of Social and Traditional Media."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57.2 (2013):187-204.
- [44] Holt, K., Shehata, A., Strömbäck, J., and Ljungberg, E. "Age and the Effects of News Media Attention and Social Media Use on Political Interest and Participation: Do Social Media Function as Leveller?"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8.1 (2013):19-34.
- [45] Gil de Zúñiga, H., Molyneux, L., and Zheng, P. "Social Media, Political Expression,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Panel Analysis of Lagged and Concurrent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4.4 (2014):612-634.
- [46] Yu, H. "Beyond gatekeeping: J-blogging in China." *Journalism* 12.4 (2011):379-393.
- [47] Bergström, A., and Jervelycke Belfrage, M. "News in Social Media: Incidental Consumption and the Role of Opinion Leaders." *Digital Journalism* 6.5 (2018):583-598.
- [48] Price, V., and Zaller, J. "Who Gets the News? Alternative Measures of News Reception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57.2 (1993):133-164.
- [49] Iyengar, S., Curran, J., Lund, A. B., Salovaara-Moring, I., Hahn, K. S., and Coen, S. "Cross-National versus Individual-Level Differences in Political Information: A Media Systems Perspective." *Journal of Elections, Public Opinion & Parties* 20.3 (2010):291-309.
- [50] Trilling, D., and Schoenbach, K. "Skipping Current Affairs: The Non-Users of Online and Offline News."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8.1 (2012):35-51.
- [51] Foreign Policy. The global cities index 2010. Retrieved from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0/08/11/the_global_cities_index_2010_20100811.jsp, 20100811.
- [52] Kauffman, R. J., and Techatassanasoontorn, A. A. "New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n Technology Adop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11.4 (2010):157-160.

94 Meaning and the Heart-Mirror: A New Perspective of Roland Barthes' Mythological Thoughts in Chinese Context in The Age of Intellectual Media

· *TIAN Yue-le, HAO Yu*

[Abstract] Since the language environment of east and west is different, Roland barthes' robbery myth thought may not be applicable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with insufficient meaning in terms of symbols and languages. Roland barthes' unappreciated practice of enriching language meaning may be more suitable for China, especially in the era of network language with excessive meaning. Barthes's other androgynous thought of mythological cracking has a linguistic dilemma, which can be solved by continuing Roland barthes's thoughts in the depth of knowledge and zhuangzi's thoughts, so as to improve the androgynous theory.

[Keywords] Roland barthes; meaning; neutral; heart-mirror

105 The Impact of Mobile News Use, Need for Orientation and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on Political Knowledge

· *LI Zong-ya, LO Ven-Hwei, WEI Ran, ZHANG Guo-liang, CHEN Yi-Ning, TANDOC Edson*

[Abstract] In the mobile phone age, people gradually rely more on mobile new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world. Very few studies, however, examined the impact of mobile news on political knowledge. This study thus aims to explore how mobile news use contributes to political knowledge acquisition. Focusing on the issue of relations between the US and North Korea, results of four parallel surveys of 2,988 respondents in Shanghai, Hong Kong, Singapore, and Taipei indicate that both reading mobile news and following mobile news were powerful predictors of political knowledge. Furthermore, this study also found that gender and need for orientation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political knowledge. Finally, social factors like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was found to mak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respondents' political knowledge. More specifically, people living in the information-rich environment tend to know more about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US and North Korea than people living in information-poorer environment.

[Keywords] mobile news; political and public affair knowledge; macro-environmental factors; micro-Individual factors; asian study